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提供了一个经济史学家归纳整个现代史的方法。这种归纳方式就是一系列的增长阶段。

我逐渐地得出了这一看法，即按照这一系列阶段，把每个国家（有时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划分是可能的，而且就某些有限的目的来说，也是有益的。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更一般的（可能仍然不是全部的）整个现代史的理论。

但是，把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和赫鲁晓夫时代的俄国、明治时代的日本和 1914 年前铁路繁荣时期的加拿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及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和纳赛尔时代的埃及的主要方面都包括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加以观察，这种方法和企图，即使温和地说，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

一开始，我要强调指出，增长阶段论是考察现代史发展顺序的一个武断的和有局限性的方法；而且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事实上，增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是要描述现代化顺序的一致性，而且也同样地要说明每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

正如罗斯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说的：“虽然把在历史上出现的关于实际情况的特殊因素归纳为一般观念是可能的，……但是把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复杂整体归纳为一般概念却是不可能的。”^①因此，我们在这里将关心“实际情况的某些特殊因素”，这些因素似乎贯穿在 1700 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历史之中。

在承认并且强调这一研究工作的局限性之后，应该指出，增长阶段论的目的是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现代化过程？常规的增长什么时候和如何成为每个社会的内在特征？何种力量推动持续增长的过程和决定它的轮廓？增长过程在每个阶段具有什么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特征？每个阶段中每个社会的独特性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什么力量决定了较发达地区和较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增长的先后顺序与战争的爆发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最后，复利增长^②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它正在把我们带到共产主义呢，还是把我们带到具有完善社会基础资本的富裕郊区？或者把我们带到毁灭，还是把我们带到月球，或带到什么地方？

增长阶段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是一种代替卡尔·马克思关于现代史理论的理论，因此，我在最后一章对他观察事物的方法和我观察事物的方法作一比较。

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虽然增长阶段论是从经济方面观察整个社会的方法，但是它绝不意味着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惟一的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在最后承认的

^① 罗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C. M. 梅尔蒂斯译（伦敦），第 3—4 页。

^② “复利增长”这个术语只是一个简称，用来说明增长通常是按照几何级数进行的，就像利息和本金都计算利息的储蓄账户一样。

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虽然经济变化的确具有政治和社会后果，但在本书中经济变化本身被看做是政治和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的结果。而且，就人类动机而言，很多最深刻的经济变化是人类非经济动机和愿望的结果。探索人类动机基础的经济增长研究学者应该决不会忘记凯恩斯的名言：“如果人的天性不愿意冒险，除利润之外对建设工厂、铁路和开矿本身丝毫不感兴趣，那么，纯粹作为冷静计算而进行的投资就不会有很多了。”^①

本书首先概述了 5 个主要增长阶段的印象性定义，并简要地说明了作为阶段论分析基础的动态生产理论。以后 4 章更多地从分析上考察和从历史和当代经验中解释传统社会以后的各个增长阶段，这些阶段是：前提条件时期、起飞、成熟和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大众化普及时期。

第七章对过去一个世纪中俄国和美国增长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一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第八章运用增长阶段论来解释侵略和战争问题，这个问题通常是在帝国主义这个标签下提出的。

第九章继续分析未来的增长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从增长阶段的角度考虑和平问题的性质。

最后在第十章中，我们明确地考察增长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这些增长阶段呢？

^①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 150 页。

第二章

增长的五个阶段概述

从经济角度将所有社会归于五种类型之一是可能的。这五种社会是：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

一、传统社会

首先是传统社会。所谓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前牛顿时代的科学技术和前牛顿时代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在这里，牛顿被用作历史分水岭的一个象征，这时人们开始广泛地相信外部世界受少数可认知规律的支配，并且相信人类能够系统地进行生产控制。

然而，传统社会的概念绝不是静态的，它并不排除产量的增加。耕地面积能扩大，一些特别的技术创新（经常是高度生产性的创新）能被引进到贸易、工业和农业中。随着诸如灌溉工程的

改进或者一种农作物新品种的发现和扩散等情况的出现，生产力也会提高。但是，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该社会能达到的人均产量水平存在一个最高限度。这个限度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的潜力不是不存在，就是未被经常地和系统地利用。

无论是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最近时期，传统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例如，传统社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贸易区域和贸易量随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程度、中央统治的效率和道路的维修情况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人口及一定限度内生活水平不仅随收成的好坏，而且也随战争和瘟疫的影响程度而升降。制造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像在农业部门一样，生产率水平由于没有现代科学及其应用和科学意识而受到限制。

一般说来，由于对生产率的限制，传统社会不得不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并且从这个农业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分层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纵向流动性虽然存在但范围是很狭小的。家庭和宗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一般是与所谓长期宿命论相吻合的：即假定一个人的孙子辈所拥有的机遇也就是其祖父辈曾经拥有的机遇。但是，这种长期的宿命论决不排除短期的个人选择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个人在一生中为改善他的命运而努力是可能的和合法的。例如，在中国农村，人们为了获得或避免失去土地，曾经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从而造成这些地方很少有同一个家庭能保住一块土地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情形。

虽然中央政治统治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存在，其范围超越了相对自给自足的地区，但是政治权力的重心一般在地方，操在那些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手中。在文官和军人的支持下，在超越地区的利益集团的控制下，土地所有者对于中央政治权力保持着不稳定的却往往是深刻的影响。

根据那时的历史，我们用“传统社会”这一术语把前牛顿时代的整个世界进行分类：中国的王朝；中东和地中海的文明；中古欧洲社会。我们还把牛顿以后这样一些社会归于传统社会，它们目前还没有被人类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控制其环境的新能力所触及和推动。

把这些多种多样的、经常变化的社会归为一类的根据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经济技术生产率的进步是有限的。关于这种社会我们确实论述得很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仅仅是在为达到本书的主题而扫清道路。本书的主题是论述传统社会以后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传统社会的每个主要特征（如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其在某种程度上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而使经常性的增长成为可能。

二、起飞前提条件

第二个增长阶段包括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即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转变传统社会需要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阻止报酬递减，从而享受由复利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和机会，而要做这些是需要时间的。

起飞的前提条件最初是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西欧发展起来的，那时，世界市场的侧面扩张和为之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产生了一个动态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现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农业和工业中转化为新的生产函数。但是，中世纪瓦解背后的所有因素都是与西欧起飞前提的创造息息相关的。在西欧国家中，英国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势，而成为第一个充分发展起飞前提的国家。

然而，现代史的更一般的情形是，前提阶段不是从内部

产生的，而是由较先进社会的外部入侵产生的。这些入侵（直接的或间接的）动摇了传统社会，开始或加速了它的解体；但是，这些入侵也推动了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引起了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以替代传统社会的过程。

有一种观点传播开来，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某些其他良好目的（如国家尊严、私人利润、一般福利，以及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等）的必要条件。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教育扩大和改变了，以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新型企业家在私人经济中和在政府部门出现了，他们愿意在追求利润或现代化过程中调动储蓄和承担风险。为调动资本，银行和其他机构出现了。投资，尤其是对交通、通讯和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可能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经济利益）的投资增加了。国内外商业的范围扩大了。使用新方法的现代制造企业到处兴起。但是，这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征仍然是传统的低效率生产方式，旧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以及与这两者相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以地方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以上所有这一切活动都进行得很缓慢。

例如，最近在很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经济活动一起存在着，这些现代经济活动是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政权为有限的经济目的从事的。

虽然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之间的过渡阶段在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平衡方面都经历了重要变化，但是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常常是政治上的。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中央集权国家以带有新民族主义色彩的联盟为基础，反对传统的地区性地主集团、殖民政权，或者两者都反对。

三、起飞

现在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分水岭：五个阶段中的第三个阶段，即起飞。起飞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在过去只是产生有限的突破和现代活动的飞地）扩大了并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复利似乎成为习惯和制度结构。

在英国和人口大量来自英国的世界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美国、加拿大等），起飞的直接刺激主要是（但并非全部是）技术上的。而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

在起飞时期，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可能从大约占国民收入的 5% 提高到 10% 或 10% 以上。虽然在有些地方，需要巨额社会基础资本来为起飞创造技术前提，但在前提阶段，投资率也可能高于 5%。例如，像 19 世纪 90 年代前的加拿大和 1914 年前的阿根廷。在这种情况下，在前提阶段，有时甚至在起飞阶段，国外资本的输入通常占总投资中的很大比例，如在俄国和加拿大 1914 年前的铁路繁荣时期。

起飞时期，新兴工业迅速扩张，其所带来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被再投资于新工厂。反过来，这些新工业迅速地扩大了对工厂工人的需求，为其服务的服务业以及其他制造品的需求，从而引起了城市地区和其他现代工厂的进一步扩张。现代部门的整个扩张过程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加，这些人不仅以高比例进行储蓄，而且将储蓄交给从事现代经济活动的人们支配。新的企业家阶级扩大了，它支配着私人部门日益增大的投资。经济利用了这

今尚未使用的自然资源和生方法。

随着农业的商业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准备采纳新的生产方法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新技术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中扩散开来。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是成功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将急剧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在 10 年或 20 年后，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转变，致使今后稳定增长率能够正常地维持下去。

如在第四章将指出的，我们能够大致上把英国的起飞阶段确定在 1783 年后的 20 年；法国和美国在 1860 年前的几十年；德国在 19 世纪 1850—1875 年之间；日本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俄国和加拿大在 1914 年前的二十多年间；而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和中国已经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发动了它们各自的起飞。

四、走向成熟

由于现在正常增长的经济推动着现代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广泛使用，起飞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长时期的持续的（即使是有波动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大约 10%—20% 被稳定地用于投资，使得产量常常超过人口的增长。随着技术进步、新兴工业加速发展和旧工业的衰落，经济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该经济在国际经济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以前需要进口的商品现在由国内生产；新的进口需要产生了，而新的出口商品满足它们。社会将与现代高效率生产的要求作出妥协，使得新的价值观和制度与旧价值观和制度达成平衡，或者修改后者，以便使它们支持而非阻碍增长进程。

起飞开始后大约 60 年（或者说起飞结束后 40 年左右）一般到达所谓的成熟阶段。在起飞阶段，经济集中于工业和技术的相

对狭小的综合，但现在它已把它的范围扩展到更精密、技术上常常更加复杂的综合过程。比如，可能会出现经济活动从铁路时代的煤、铁和重型工程工业为中心转变到以机器工具、化工产品和电子设备为中心。到 19 世纪末或稍后一段时间，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已经过了这个转变。但是从起飞到成熟的过程中，还经历了其他部门形态。这些形态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我们可以把成熟正式地定义为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以及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如果不是全部资源范围的话）吸收和有效地采用（当时条件下）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的能力。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经济显示出其拥有技术能力和企业家才能来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任何东西，而不是生产一切东西。一国经济（例如像目前的瑞典、瑞士）可能缺乏原材料或经济地生产一种特定类型产品所需要的其他供应条件，但是，它的依赖是一个经济选择或者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制度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上看，一个社会从开始起飞转变到成熟，大约需要 60 年时间。在分析上，对这段时间的解释可能在于对应用于资本存量的复利的强有力计算，这个资本存量与一个社会连续三代（生活在正常增长的体制下）吸收现代技术的能力的更广泛的各种结果是分不开的。但是，很明显，关于从起飞到成熟的准确时间长度，任何教条主义都证明是不合理的。

五、大众高消费时代

我们现在考察大众高消费时代。这时，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美国开始步入这一阶段；西欧和日本在开始精神饱满地探索这个还没有获得的快乐；苏联也在遮遮掩掩地涉足这

一阶段。

当一些社会在 20 世纪达到成熟时，有两种现象发生了：一是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使得大多数人能获得超过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二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不仅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上升了，而且在办公室或在工厂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人口比例也上升了——这些人了解并渴望获得成熟经济的消费果实。

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之外，社会不再接受把现代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成熟以后的阶段，西方社会通过政治程序选择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福利国家的出现就是社会超越技术成熟的表现。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如果消费者主权占优势，则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缝纫机、自行车，然后各种家用电器逐渐得到普及。然而，在历史上，决定性的因素是便宜的大众化汽车——它对人民生活和社会预期产生了革命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美国可能是以 1913—1914 年亨利·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作为转折点。但实际上，只是在 20 年代，后来再一次在战后 10 年，即 1946—1956 年间，这个增长阶段才到达逻辑终点。由于战后几年经济的迅速增长，西欧和日本在 50 年代似乎已完全进入了这一阶段。苏联在技术上为这个阶段作准备，各种迹象表明它的人民也渴望它来临，但是如果要发动这个阶段，共产党领导人则面临困难的政治和社会调整问题。

六、消费阶段以后

消费阶段之后，除了可能观察美国之外，就无法预测了。在

过去 10 年中，在耐用消费品达到一定消费水平后，美国人的行为至少已经表现出，好像耐用消费品的相对边际效用递减开始了。他们在边际上选择了较大的家庭，如同巴登布洛克式动态 (Buddenbrooks dynamics)^① 行为那样。与一个大家庭所带来的优点和价值比较起来，美国人的行为好像是，由于出生在经济有保障和大众高消费的制度中，他们对以常规的方式获得实际收入的额外增加看得不很重要。但即使我们敢于归纳，由于变化得太快了，我们也无法根据一个实例（以婴儿为基础）继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创造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因为经济学家们也许会说，婴儿需求的收入弹性在不同社会可能差别很大。但千真万确的是，婴儿潮的意义与并非完全无关的社会基础资本的不足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在未来 10 年支配着美国经济，而不是耐用消费品的进一步普及。

这里我们是以一般印象的方式而非仔细分析的方式，描述了增长阶段。一旦传统社会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增长就能够划分如下阶段：起飞前提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一般是作为对外国势力侵入的反应而创造出来的，然后把国内某些力量汇集起来推进现代化；起飞本身；走向成熟——一般要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最后，如果收入的增加已与技术的扩散相适应，完全成熟的经济就转向为日益增加的城市和郊区人口提供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如福利制度那样）。高消费之后就存在一个是否会出现长期的精神颓废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将如何防止它，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① 在托马斯·曼的一个关于三代人的小说中，第一代追求金钱；第二代一出生就有钱，追求社会和政治地位；第三代一出生就既舒适又有家庭名望，追求音乐生活。这一术语用来表示各代人追求的不断变化，因为他们对于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看重，而寻找新的满足方式。

在下面 4 章中，我们将更明确地、更严格地考察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以及导致大众高消费时代的过程。但是，即使在这一导论章里，也应该弄清楚这个体系的一个特点。

七、动态生产理论

这些阶段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概括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些事实观察的方法。这些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连续性，拥有一个以动态生产理论为根基的分析框架。

古典生产理论是在基本静态的假定下形成的。它把与经济增长过程密切相关的变量固定不变，或只允许一次性变化。由于当代经济学家试图把古典生产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析综合起来，他们已经引入动态变量：人口、技术、企业家才能等。但是他们倾向于以如此严格和一般的形式把动态变量引入理论中，以至于他们的模型不能像经济史学家那样抓住增长的本质现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动态生产理论，它不仅分离开收入在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分配（和生产在消费品与资本品之间的平衡），而且直接和较为详细地集中在投资的构成和经济中某些特殊部门的发展。下面的讨论是以这样一种灵活的、非总量的生产理论为基础的。

当对生产理论的传统限制扩宽时，不仅为总产出、总投资和总消费，而且为每个经济部门确定理论上的均衡位置是可能的。^①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过程》（牛津，1953年），特别是第4章。也可见《长期增长的资源分配趋势》，（《经济进步》第15章，利昂·H·杜普瑞编，道格拉斯·C·黑格助编（路维恩，1955年）。

在决定总产出水平的各种力量所确定的框架内，部门的最优位置在需求方是由收入和人口水平以及偏好的性质决定的；在供给方是由技术状况和企业家才能的品质决定的，而后者决定那些技术上可行和潜在有利可图的、实际上被合并到资本存货的创新的比例。^①

另外，必须引入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假设：由于来自供求两方面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减速是一个部门正常的最优路径。^②

从这些准则的应用中出现的均衡是一组部门路径，从它们中又可以直接推出最优投资模式的顺序。

当然，历史上的投资模式并没有确切地遵循这些最优模式，它们被私人投资过程的不完善，政府的政策和战争的冲击扭曲了。战争通过建立任意的需求和改变供给条件而暂时改变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战争摧毁资本。然而，有时它们加速了与平时时期经济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它们以促进和平时时期增长的方式改变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周期和趋势阶段的历史顺序产生于实际模式和最优模式的偏离。这些波动与战争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历史上的增长路径不同于事前精确计算的最优模式的增长路径。

虽然如此，增长社会的经济史还是从社会向最佳部门路径接近的努力中吸取了一些原始的形式。

在任何一个时期，各个部门增长率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它们演进的早期阶段，在经验上分离出某些主导部门是可能的——这些主导部门的急剧扩张率在保持经济的总体增长势头方面发挥

^① 在一个封闭模型中，作为投资的部门方面，动态生产理论必须解释基础科学和实用科学存量的变化，这一点已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作了解释，特别是第 22—25 页。

^② 《经济增长的过程》，第 96—103 页。

着关键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为了某种目的，根据主导部门来描述一国经济的特征是有用的。增长阶段的技术基础部分原因就在于主导部门次序的变化。基本事实是，一些部门在其早期倾向于有一个急剧增长阶段，这就使我们把经济史看成是不同阶段的顺序演进而不仅仅看成是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连续性成为可能和有意义。

但是，增长阶段要求考虑需求弹性，要求扩宽需求弹性概念，因为一些部门的迅速增长阶段不仅源于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而且源于高的需求价格弹性或需求收入弹性。主导部门不仅是由技术流的变化和企业家采纳现有创新的意愿的变化决定的，而且部分地是由显示出高价格和收入弹性的需求形式决定的。

然而，对资源的需求不仅产生于由个人偏好和选择确定的需求，而且也产生于社会决策和政府的政策——无论它们是否反映民主。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社会在处理资源时按照超越传统市场过程的条件所作的选择。有必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察社会福利函数，包括那些决定函数的非经济过程。

例如，当收入变化时，出生率过程代表社会作出的某种形式的福利选择；人口曲线反映出（除死亡率变化之外）在不同阶段关于家庭规模的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在起飞期间或起飞后不久，随着城市化的实现，进步成为实在的可能性，出生率从通常（但并非普遍）的下降到最近的上升，如同美国人（和以大众高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中的其他人）似乎已经在较大的家庭中寻找价值——这种价值超出了由经济保障和耐用消费品及服务的丰富供给所提供的价值。

此外还有社会作出的其他决策，这是因为社会面临的选择已被开展的经济增长过程改变了。这些广泛的集体决策是由市场之外的、深含于历史、文化和积极的政治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决定的；它们与市场需求、承担风险、技术和企业家的动态过程相互

作用，决定着每个社会增长阶段的特定内容。

比如，对一个较先进的强国的侵略，传统社会应该如何作出反应？是像日本人那样团结一致、生气蓬勃、迅速作出反应？还是像受压迫的爱尔兰人那样逆来顺受？或者像中国人那样迟迟不愿意改变传统社会？

当现代独立的国家建立起来时，应当如何利用民族的精力？是用于外部侵略，还是用于纠正旧的错误，或是利用新出现或新发现的机遇增强国力？是用来完成和完善新的国民政府对旧地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胜利，还是用来使经济现代化？

一旦增长处于起飞阶段，扩散现代技术和使增长率最大化的要求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增加人均消费量和增加福利的欲望所抵消？

当技术成熟时代到来、国家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各种工业机器时，它应该出于什么目的？应该按照什么比例：通过福利国家增加社会保障？把大众高消费扩大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领域？提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权力？或是增加闲暇？

往后的问题，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只是零散的东西：当实际收入增加本身失去了魅力时该怎么办？婴儿、厌倦感、三天周末、月球或者新的人类极限之内的创造将会取代稀缺性规则吗？

在概述了每个增长阶段的一般轮廓时，我们不仅考察经济的部门结构，这些部门不仅为增长而改变自己，而且还不断增长壮大；我们还将考察不同社会对于资源分配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它们包含但又超越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

第三章

起飞的前提条件

一、两种情况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起飞的前提条件：一个社会为持续增长做准备（或者由外部力量准备）的过渡时期。

我们首先有必要区别历史所提供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可以称为一般情况。不仅欧洲大部分的演变，而且亚洲、中东和非洲更大部分的演变，都适合于这种情况。在这种一般情况下，创造起飞的前提条件要求已经确立的传统社会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触及而且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

还有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包括少数国家，这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生而自由”的国家：^①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许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国家主要是从在过渡过程中已经走得很远的英国产生的。而且，这些国

^① 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传统》（纽约，1955年）一书中使用过这个名词。